

非經濟因素對中共經濟的影響

鄧辛未

人所共知，發展經濟，需要制定一套清晰明確的政策，以期實現某一特定的目標。比如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在中國大陸，情況與日本不一樣。雖然，中共也曾宣佈過一些發展目標，例如：高速度成長、自力更生、區域平衡，以及現在所實行的對外開放、改革等政策，可是，中共一直沒有一套從頭到尾一貫的經濟發展策略，來達成這些目標。溯自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中共的經濟政策，是左右搖擺不定，無論是意識形態、經濟政策、人口政策、政治策略，特別是資源分配方案，各部門發展的優先次序，或是對科學技術的選擇，總是反覆搖擺，舉棋不定。基此，中共這種經濟發展策略的不斷改變，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特別是非經濟因素所造成的。影響中共經濟的非經濟因素，主要有以下各項。

一、政治因素

政治在共黨國家至為突出；是經濟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的結構化程度（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之高低，及政府能力（特別指規制能力，運籌及理性分配之能力），大大的影響經濟發展。

中共的政治是「意理政治」（Ideological Politics），意理在中共的政治中所扮演，即是所謂「下層建築」的作用。中共所採行的馬列主義，基本上是列寧主義和史大林主義，這是因為中共當時在經濟落後的中國大陸，發動「共產主義革命」，而中共要在落後的大陸，推行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則當時的史大林主義，就是現成的模式。因為共產主義，

在理論上不必不能與民主結合，而民主是可與任何經濟制度合作的。

中共強調要實施「四化」，但卻沒有政治民主的現代化，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對中共來說，政治現代化是整個現代化的樞機。同時，經濟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如工業化不成功，經濟無法起飛，則整個現代化的工作，都將沒有辦法去推動。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現代化之強勁活力，幾可歸因於其生猛的經濟現代化，而當前政治上的種種變遷問題，與經濟現代化，皆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可是政治並非經濟的附屬品，也非其上層建築這樣簡單。政治有其獨立性、自主性，它與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千絲萬縷，最堪注意。

三十五年來，由于中共長期政治運動及政治鬥爭，大大阻礙大陸經濟的成長。同時，因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激烈鬥爭，權力更迭，及政治運動過多，「人禍」也特多，自然影響到經濟發展。誠如已故社會學家帕深思（T. Parsons）所指出，西方原初的工業化的動源來自私人資本家，二十世紀工業化的複來者，則鮮少不以政治權威作為必要的動源。^①

比如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初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到該年五月，不但已推翻一九五八年二月間的年度規畫，而且已改變其計畫經濟體系及經濟路線。這次「大躍進」運動，自其本質言，及對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來，中共內部穩健緩進思想的一種反擊，為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的必然產物。而促成這一運動的瘋狂展開，則是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澤東到莫斯科乞取俄援的失敗有關。在躍進期間，經濟損失二、〇〇〇億元（「人民幣」——下同），工業生產下降七〇%，文化大革命時期，經濟損失五、〇〇〇億元，

鋼產量減少二、八〇〇萬噸，財政收入損失四〇〇億元^②，使國民經濟瀕臨破產邊緣。然而，就在如此的基礎上，華國鋒却又重提「四化」構想，并制定「洋躍進」的十年經濟規畫；結果又造成「兩年失誤」。一九七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決定「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來挽救過去政治運動所造成的經濟危機。

總之，由於共黨本質上的原因，中共經濟不可能離開政治因素的影響，更由于中共領導集團，花在鬥爭的功夫上，比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還多，「政權」與「社會」均極不穩定，因此，也是破壞經濟最直接的因索。

同時，中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兩者是產生腐化官僚作風、貪污、經濟犯罪、特權橫行的根本原因，也是破壞經濟最有力的力量。

二、經濟因素

中共現行的計畫經濟，係以蘇俄為藍本。這一制度，無論在精神及運用上，與目前大多數國家所實行的經濟計畫，均有不同。

據中共所編的簡明社會科學詞典的計畫經濟是：國民經濟在國家統一計畫的指導下，按比例協調地發展的經濟制度。只有在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實行。在計畫經濟條件下，國家要根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國民經濟有計畫按比例發展規律以及其他經濟規律的要求，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制訂科學的統一的國民經濟計畫，用來調整各方面的比例關係，報導各地區各部門協調地發展，在實行計畫經濟的同時，要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③中共認為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它能夠合理分布生產力，節約而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財力，迅速發展科學技術，使社會生產按比例地高速度地發展，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當代大多數國家，所實行的經濟計畫，祇是由其內閣或議會，參酌全國各種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s）所提供的計畫，對國民經濟發展，作若干基本性的設計。至於國民經濟的主要程序，如生產分配流通等，仍以價值法則為自動調節的工具，政府只運用若干重大政策以影響國民

經濟發展的方向，而不作無所不包的統制管理。但在蘇俄及中共的計畫經濟體系中，全國資源、生產、消費、分配、國內貿易、國外貿易等相互間關係，均由國家計畫委員會作嚴格的規畫。社會中全部的經濟活動，均須按計畫由政府直接統制，並要求在一定時期內達成一定的指標。這一無所不包的計畫經濟，其優點是利便節制國民消費，擴大資本累積，其缺點是違背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使社會經濟逐漸趨於僵化。因為經濟的發展，乃包括人與人、人與物的雙重關係。經濟行為一方面為社會行為，一方面又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和限制。而嚴格的計畫經濟，事實上必無法推行。其主要原因如下：（一）社會商品的生產，絕大部份為滿足人民的消費，而人民的消費慾望，則係經常變動不居，根據政府計畫而生產的商品，決無法與人民消費的慾望相適應。（二）現代工業的生產，其本身即係一有機體，各種商品之間，常有代替作用及補償作用，不可能由一計畫作嚴格的畫分及統制。（三）農業的生產，無論在極權或自由國家，均受自然條件的影響，農民的收入，和農產的豐歉有直接的關聯，亦非經濟計畫所能支配。在這三項原因之下，任何企圖控制一切的計畫經濟，必然會產生削足適履的毛病，而嚴重摧殘國民經濟發展的生機。^④

事實上，如果不是嚴格的計畫經濟，希望達成一定效果，最低限度應具備三項條件：（一）是全國的經濟，必須以大工業為主幹，因為只有大工業才具備集中生產及大量製造的特點，以大工業為主體的經濟，才易於推行計畫經濟。（二）計畫經濟的擬訂及實施，必須有健全的統計及會計制度，然後一切計畫才有所依據，不致陷於閉門造車。而計畫的執行結果，才能作較準確的稽核。中共的統計制度，一向極為脆弱。因此，其經濟計畫的釐訂，事實上均缺乏可靠的基礎。（三）計畫經濟的執行，必須有安定的社會，健全的組織，效率極高的政府，才能按日計功。^⑤

中共計畫經濟的執行，據河南省「計畫委員會副主任」邵文傑的檢討：「事先既無準備工作，編製時又不詳細研究，只憑主觀願望出發，沒有實際根據，草率從事，粗製濫造，以應付任務，甚至有所謂『計畫自計畫，執行自執行』的思想」，「在執行計畫上，並沒有把完成計畫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有的單位不把計畫交給群眾，不根據計畫辦事，也不根據計畫來檢查

執行情況，由領導上指東畫西，隨意安排，有的單位不重視計畫的嚴肅性，而隨意改變計畫。」⑥在此種情形之下，其各種經濟計畫，如非流於形式化，便必然成爲各級領導幹部主觀願望的產品。

同時，首先是中共的計畫經濟，完全忽視中國大陸以分散的小農經濟爲基礎的特點，急於將國民經濟全部納入國家計畫，故其所訂各種計畫，包羅過廣，規定指標不切實際，因而整個計畫體系，成爲發展生產的桎梏。這完全是人爲的因素。

而當前中共經濟發展策略和政策，可說是其領導人希望大大修改過去所承襲的全部經濟發展模式——蘇聯模式（中央計畫經濟體制），史大林模式的發展策略，和毛澤東激進原則，來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中共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行，使中共面臨了嚴重的比例失調，和經濟效益低落的成長瓶頸。這主要的癥結，乃在於經濟制度過於中央集權化；經濟計畫的制定及執行脫離現實；強制性的指標，束縛了經濟發展，以及勞動群眾缺乏積極性。基此，改進經濟效益，和力求經濟平衡發展，已在中共經濟決策中居於極重要的地位；經濟發展模式的修正（事實上是走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路子），是涉及管理體制的改革，和發展策略的轉變，特別是經濟改革及經濟結構的調整。

最近幾年來，中共在經濟「改革」及「調整」兩方面，曾採取一系列措施如下：改變經濟發展優先發展程序，緊縮工業特別是鋼鐵及機械工業，加速發展輕工業，削減生產性基本建設投資，增加房屋建築；（二）農林管理體制的改革，在農林實行包產到戶，包乾到組；到戶、到勞。擴大自留地，以刺激農民生產意願，擴大基層單位自主權和按勞取酬訂定合同生產責任制；（四）中共工商企業體制的改革，主要是提高企業自主權，改善企業收益的分配，讓企業多留利潤，以刺激生產。（五）改革企業人事管理制度，授予廠長、經理一定的人事權，打破「鐵飯碗」制度，（六）爲配合企業體制改革，對於總體經濟層面，也進行若干改革。即減少使用直接指令性的控制，而代之以經濟槓桿，以加強企業的應變能力，減輕計畫機構的工作的壓力。（七）藉鼓勵競爭，和財政獨立，迫使企業提高經濟效益。

中共的經濟改革，似和匈牙利的改革，走相反的方向。匈牙利是先

整頓黨本身，不要有蘇聯的干涉，在黨的統制下漸進的，採用市場經濟，容許企業的自主性和企業的相對獨立性。連這樣的匈牙利，現在也除了修改獨裁制以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中共和過去一樣，它的作法，只偷取先進經驗的成果，而漠視問題的前提條件。所以，在開始似乎是成功了，可是逐漸露出缺陷，而招致混亂。

當前鄧小平派，是實施物質刺激，來提高民衆的生產意願。具體的是採用農業的承包制，和容許企業的自主權，在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爲基礎的計畫（命令）經濟上，部份採用市場經濟的辦法，准許農民的副業生產品或輕工業品在自由市場交易。因此可以實現「國家」計畫，又可以增加農民、工人的收入。

這樣，使富有商業才能的人，成爲以「冒尖戶」爲名的「暴發戶」；使非國營企業的企業收益提高，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從未有過的混亂。

因爲，本來稱爲國有國營經濟的「名義上的社會主義經濟」，實際上是中世紀的家產體制，是資本主義經濟以前就有的東西。中共、蘇聯及其他共黨國家，三十多年來，逐漸暴露出其本質上的缺陷，經濟極爲蕭條。中共爲克服這個困難，逐漸採取緩和的政策，作爲提高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的手段。它雖然能使僵化的經濟情況，獲得改善，可是也帶來從未有過的矛盾及混亂。特別是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並存，是非常煩瑣的組織，比過去用行政命令的煩瑣性還要麻煩。同時，最致命的是和過去的官僚主義的煩瑣性及缺陷一起並存。所以，在這一點上，現在中共的經濟，比匈牙利更加複雜，而且嚴重。因爲中共在政治經濟上所面臨的，歸根結柢一句話，還是中山先生當年所提出的「民權」和「民生」問題。

三、人口因素

從中共「十二大」開始，以本世紀末作爲目標，擬訂了在工農業總生產值，達到「翻兩番」的過程中，將其全國總人口抑制在十二億以內。因此，中共在經濟建設中，不得不採取「計畫生育」的非常手段，更顯示出中國大陸人口問題對中共政權具有死活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中共爲了掙

扎求存，來解決人口與經濟的不均衡，為此，只有強制執行嚴厲的實施一對夫婦只能生育一家一子計畫生育的人口政策。

一九八二年六月卅日廿四時，中共實行「第三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雖然公布大陸人口總數是十億零八百七十七萬人，到年底，又達到十億一千五百四十一萬，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二。

一九八四年四月卅日「人民日報」透露：一九八三年底大陸人口為十億二千四百九十五萬人，出生率為百分之十八點六二，死亡率為百分之七點零八，人口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一點五四。

從一八四九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年間，中國大陸的人口只不過增加一億二千八百六十八萬人而已。⑦可是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間，淨增了四億三千四百二十五萬人。⑧

再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二年止，在三十二年之間的增加情形，作一初步分析：

一九四九—一九六〇年的十年，淨增了一億二千零四十萬人，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點二。

一九四九—一九七〇年的二十年，淨增了二億八千八百二十五萬人，增加百分之五十三點一。

一九四九—一九八〇年為止三十年，淨增了四億四千五百三十八萬人，增加百分之八十二點二。

一九四九—一九八二年的三十二年，淨增了四億七千三百七十四萬人，增加百分之八十七點五。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三年的三十三年，淨增了四億八千三百二十八萬人。

由上可知，大陸人口增長的幅度，是非常迅速的，和一九四九年的人口，約增加一倍。

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二年的增加數，和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的一百年間的增加數，超過了三點五倍。⑨

在這一期間，儘管發生過一連（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三年大飢饉，餓死了三千萬人，和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三千七百萬嬰兒合併計算的話，

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代價，是把六千七百萬人，送進了萬劫不復的地獄。⑩

雖然死亡了這麼多人，但仍然出現一九五〇—一九五八年，人口出生高峯期。這九年期間的年平均出生率是二千零六十萬人，其次就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這九年期間的年平均出生數，已達到二千六百餘萬人，在這兩個（十八年之間）尖峯的年齡層的人口，和其它時期的人口比起來，每年要多出生數百萬乃至到一千多萬人。⑪

從當時中國大陸總人口的消長來分析，一九五九年為六點七二億起；一九八〇年則降為六點六二億，一九六一年又減為六點五九億。但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又恢復到一九五九年的六點七二億的水準，在在顯示中國大陸具有巨大的人口再生產的潛在力量。

為何有這種巨大的人口壓力，最主要便是毛澤東倡導的「人多好辦事」，「人多是好事」的「人手政策」所造成。認為「革命加生產」就可以解決人口問題。事實上是完全否定的。而且中共完全忽視了人口增加的速度，對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妨礙，給中共經濟帶來了許多無法解決的困難。

中共第三次人口調查，大陸有文盲二億三千五百八十二萬人，一般中共幹部，只是初中程度，人民文化程度低落，人力資源沒有開發，人力資本沒有積聚，科技落後等，這樣對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現代化，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同時，以自然資源來說，中國大陸最多只能容納五億人口左右，這是中共專家的測算出來的數字。因為人口超過資源、土地、糧食的供應量，即將帶來許多無法解決的困難。

其次，教育制度的恢復，高等教育學位的授予，人力投資的增加，人力資本的積聚，人力資源的開拓及運用，可以提高人民的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

但是，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用以滿足人民企盼的新措施，往往更加深其慾望。大陸人民生活的改善，知識水準的提高，以及對外開放政策的影響下，將刺激並提高期盼和慾望的層次，這尤其對於經濟發展初期階段

，且又長期遭受封閉的中國大陸社會來說，慾望的增長，必然遠超過經濟能力成長的速度，使物質慾望和滿足物質慾望的能力之間，存有愈來愈大的差距。時間愈久，差距演變下去，將招致社會挫折感和不滿，不只能影響中共經濟的進步，且能動搖中共政權的基礎。

四、社會因素

社會變動的範圍，包括人群、制度、社會結構的突變、人口結構的變動、社會發展、衰落等，在時間上所遭遇的一切情況。所見到的有下列因素：

(一) 工藝技術發明創造——人類社會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社會組織的結構及功能，常受到工藝技術的發展而有所改變。因為工藝技術的改變，增加人類生活的範圍，獲得以往得不到的事物，而且，工藝技術的發展，可能影響人們互動的方式，也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二) 意識形態的問題。意識形態本身具有社會變遷的能力。如韋伯的資本主義崛起論，就強調意識形態的貢獻。

(三) 競爭衝突的問題。衝突是造成社會變動的主要原因之一。社會學家馬丁戴爾(Don Martindale)曾說過：人類社會史上最富創造性的時代，並不是和平穩定的時代，而是混亂和不安的衝突時期。

(四) 就政治因素來說，在社會變動理論上，政治和政府常常擔任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政府輔導的作用，可以影響社會變動的時度及方向。比如四月廿七日美國總統雷根在大陸指出：信賴人民，這幾個字，不僅是美國歷史的精神所在，也是今天推動世人進步的最大動力，忽視這個四字真言的人，註定要在不斷競爭的世界中敗北。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最可觀進步的社會，不是那些組織最嚴密，甚至不是那些天然資源最豐富的社會，而是那些人們得以開創、競爭、建設的社會，每個人可以為自己着想，自己作經濟決定，從自我冒險中獲利。這樣的社會是最繁榮、進步有衝勁的自由社會^⑫。

雷根在中國大陸強調自由和市場經濟的價值，有其政治的目的。因為在自由主義的觀點中，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密切相關，所謂「市場決定」

，即是「市場價格」。也就是市場投票，更是人民投票。這種觀點，雖已被修正，但是，相信人民，讓人民在自由而平等的條件下，充分發展自我，却是民主政治顛撲不破的道理，也是建立理想社會的前提。因此，相信人可以發展自我，並給人民自由發展的環境，是必須的。

大陸人民已產生三信危機，雷根這一些話，將在中國大陸社會產生一定程度的衝擊。

(五) 經濟因素：經濟體系一直被學者們公認是社會變動的主要原因。多年來，中國大陸社會醞釀着相當大的變動，人民對集體生活很不滿，渴望自由及改革。雷根代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十億人口推銷自由和市場經濟，寄望因勢利導，促使中共早日拋棄共產神話，早一步從經濟的自由中邁向生存的自由、政治的自由。記得雷根曾經在競選美國總統時說過一句話：「政府最大的職能，是在當裁判而非當球員。」中共的政府，却是扮演所有的裁判和所有的球員，因此經濟愈搞愈糟。

(六) 就社會結構來說，一個社會常因內在和外在的因素，而肇致失調的現象，這些失調，乃導致社會變動。通常失調的原因，包括如下：①人口因素；②社會的迷亂；③資源的不足；④角色的衝突；⑤社會職務的衝突等。

一般來說，社會是常在動態中，其動有的是自動，自動是由社會內部發生的動。有些社會的生命力強，它們就會健康而顯著的變動，常有新文化出現，大放光彩。

但是，也有些社會，生命力弱，推陳出新的改變就少，也顯得老舊呆板。同時，一個僵化遲滯、生命力弱的社會，就沒有，或很少內在力量來發動變動，而共產社會便是此類的典型。

五、結語

從有共黨政權到現在，在經濟方面，始終面臨着集權與分權問題，中央與地方或者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的矛盾問題，計畫經濟與市場問題，行政管理與按經濟規律辦事問題，企業內部黨委集體領導與一長責任制問題，平均主義與個別鼓勵問題等等難以解開的死結。歸根結柢是社會主義

經濟體制的問題，而這個體制的建立，不能單純歸咎於史大林，更基本的是一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構想與現實生活無法契合的問題。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再一次總結了歷史經驗，這一總結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應走的「正確道路」十個要點。這十個要點中第一點強調指出：「人民日益增漲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當前大陸要解決的「主要矛盾」。這就證明：人總是人，人不是動物，人有理性、人性，人有它的尊嚴，人有它的自然需求，每天除了吃飽、穿暖之外，人要求發展，人還需要物質上、心靈上、精神上的滿足。共黨的「教條」，「政治運動」，以及所謂「優越的社會主義」等等，是不能滿足人們這些慾望的。人民生活慾望的升高，只有提高生產力，用經濟發展來提高生活水準。但是，大陸人民生活水準若走上軌道，中共首先必須放棄四個堅持，克服上述的非經濟因素、克服人的問題、人口壓力、科技落後、人力資本薄弱……問題，否則仍將停留在落後的困境。同時，中共政權的基礎也將動搖。

註 釋

- ① T. Parsons "Structure and Process in Modern Societies" N. Y. Free Press. 1960, Pp. 98-131".
- ② 數字轉引自尹慶耀：「中共的經濟改革與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刊問題與研究 23 卷 11 期頁十七。作者未註明來源。73 年 8 月 10 日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 ③ 宋原放主編：簡明社會科學辭典頁一六八，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上海辭書出版社。
- ④ 鄭竹園：「中共經濟的診斷」頁二二六，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⑤ 同上。
- ⑥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 ⑦ 廣瀨一：「中國大陸人口問題」頁二，為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十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論文之一。

⑧ 中共「國家統計局」編，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鑑」中文海外版、香港經濟導報社，一九八三。

⑨ 同⑦頁三。

⑩ 傅建中：「害死三千萬人的「大躍進」，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國時報二版專欄。

⑪ 許滌新：「論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係」，一九八三年中共出版之第三期「人口研究」雙月刊。

⑫ 一九八四年四月廿八日台北聯合報頭版綜合外電報導。

人人文庫特七一—特七二三

三國兩晉人物小傳年表(上下册)

方鵬程 編著
定價 九〇元

三國兩晉，前後二百餘年，連年戰爭，人才輩出，或獻奇策，以求安邦定國；或偏好黃老，歸隱田園。如諸葛亮、周瑜、祖逖、陶淵明、王猛等。他們的遭遇可為前車之鑑，傑出人物的作為，可為後人典範。本書選擇三國兩晉重要人物約四十餘人，以小傳描述其成敗，以年表紀錄其一生，不但可勵志壯懷，並兼具參考價值。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